

《文学遗产》选集第五辑

學境

——二十世纪学术大家名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文学遗产》选集第五辑

學境

——二十世纪学术大家名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遗产》编辑部 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境:二十世纪学术大家名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遗产》编辑部编.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11

ISBN 7 - 5325 - 4367 - 6

I. 学... II. 中... III. 文化—名人—人物研究—
中国—20 世纪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1527 号

《文学遗产》选集第五辑

学 境

——二十世纪学术大家名家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遗产》编辑部 编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2.125 插页 2 字数 520,000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 - 5325 - 4367 - 6

I·1864 定价: 58.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序

陶文鹏 刘跃进

在二十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向现代化转型的历程中,先后涌现出梁启超、王国维、鲁迅、胡适、陈寅恪、俞平伯、钱钟书等开辟学术新局面的大家,还有更多在学术上卓有建树的名家。为了及时地总结他们的学术成就和治学方法,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值得学习借鉴的学术范式,并为这百年学术的发展变迁保存先贤的学术足迹,《文学遗产》杂志从1986年第6期起,开辟了“学者研究”这一专栏,不定期地发表对学术大家和名家进行深入研究的论文,描述他们的治学道路,总结他们的学术成就,提炼他们的学术精华,当然也不回避他们的学术教训。收入本书的43篇研究38位学者的论文,基本上就是《文学遗产》1986年至2005年“学者研究”专栏上所发表的论文的结集。

俞平伯先生在《唐宋词选释》前言中指出:“从来论诗,有大家名家之别。所谓‘大家’者,广而且深;所谓‘名家’者,深而欠广。”引申到学问领域,博大而精深是大师的境界;而杰出的学者则侧重于精深一面。事实上,不论大家也好,名家也好,也不论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从事研究工作,凡是能够在各自不同的学术领域取得令世人瞩目成就的,又总有一些相同或者相近的特点。从本书中所论及的那些大家和名家的治学经历来看,他们对于自己所从事的研究工作始终抱有一种敬畏的态度,把学

术作为毕生的事业来追求,甚至视学术为生命。这是他们的共性,也是最叫人感动的地方。其次,他们都有着广博的学术视野。也许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很小的题目,但是在这课题的背后,你却感受到坚实厚重的学术支撑。这道理其实并不难理解:“天下有博而不精者,未有不博而精者也。”(《杨守敬评碑评帖记》)更重要的是,他们敏锐而果敢地抓住了他们所处时代提供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用新的眼光、新的时代精神、新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照亮了他们所从事的具体研究对象”(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小引》)。从而为二十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事业开创了全新的局面。

二十世纪已经成为历史。然而前辈学者的道德文章是不会轻易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出学术舞台,因为他们的创新思想,他们的学术规范,他们的治学方法,都已经作为丰富的历史积淀而永远滋润着学术的常青树。我们今天纪念前辈学者,当然不是在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从他们的治学经历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如果说二十世纪是古典文学研究向现代化转型的世纪,那么二十一世纪则是古典文学研究确立自身范式的世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又赶上了一个发现的时代,一个期待创新、而又有可能创新的时代。电子文献的横空出世,出土文献的层出不穷,国外文献的频频激荡,都为我们的学术发展提供了一个广袤的空间。如何把握这样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我们想到了王国维曾说过的一段话:“大抵学问常不悬目的而自生目的,有大志者未必成功,而慢慢努力者反有意外之创获。”(姚名达《哀余断忆》之二,载述学社《国学月报》第二卷,1927年10月)这是他一生学术生涯的总结,对于新世纪的学术研究也具有莫大的启发意义。从当时的学术状况看,王国维传统学术根基也许不是最雄厚的,某些坚守传统学术领域的学者对于王国维似乎不以

为然,批评他在汉唐注疏方面功力不够。而趋新学者则认为王国维不过是一个伟大的半成品,其评价也有所保留。但是二十世纪的学术发展实践证明,王国维目光如炬,他的“预流”之作引领了一个时代的潮流。这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推动学术进步固然需要文献的积累,但根本因素还是观念的更新。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术的面貌。就我们所供职的文学研究所而言,1953年成立之初就明确规定了治所的根本方针任务:“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1954年,《文学遗产》创刊时也强调“用科学的观点来研究我们的文学遗产”。这里所说的“科学的观点”,就是马列主义的观点和思想方法。二十世纪的学术实践证明,凡是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真正作出贡献的人,无不在文学观念上有所突破,在文献积累方面厚积薄发,并勇于在求实中创新。

我们在充分肯定二十世纪古典文学研究成就的同时,也不必讳言存在的问题。近现代以来,随着学术观念的变化,以论带史等理念先行观念竟然成了文学研究的主流意识。似乎文学史家的任务主要就是依据某种或某些理论主张去梳理文学史的发展线索。其结果必然是自主创新意识的日益淡漠,在经历了“东倒西歪”的震荡之后,我们突然发现失去了理论方向,过去所熟知的东西变得隔膜起来,过去很明晰的观念也变得模糊起来。于是,新的世纪,我们在反思,古典文学研究工作者的任务难道仅仅是为某种现成理论作注疏吗?事实上,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史家在细心梳理文学史发展过程的同时,也应当努力从中归纳出若干新鲜而切实的理论。因此,很多文学理论家往往就是文学史家;或者反过来说,文学史家往往又是出色的文学理论

家。譬如刘勰和他的《文心雕龙》，钟嵘和他的《诗品》，就是一身而兼二任的典型代表。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中国文学理论体系，构筑古典文学研究范式，就不仅仅是一个实践问题，更是一个亟待突破的理论问题了。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学问。我们没有资格妄自尊大，但也没有必要妄自菲薄。重温二十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历史，我们固然强烈地感受到学术高山的压力，但也日益清醒地意识到历史所赐的机遇。2004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体现了党中央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古典文学研究界应当积极抓住历史机遇，充分发挥自身积淀的深厚学术优势，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科学发展观作为指导思想，把文献学和文艺学、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很好地结合起来，从文学、历史与哲学的贯通中，从中学和西学的交融中，从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传承中，挖掘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意义。只有这样，我们的研究成果才会具有坚实的文献功底，才会具有文学性、学术性和当代性，才会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品格。

学术要有追求，也要有层次，更要有崇高的境界。这是我们编完这部论文集后的最深切感受。我们深信，读过本书，哪怕是只读其中的一篇，广大读者也一定会结合自身的经历，从书中获取更深刻的治学的与人生的启迪。

上海古籍出版社乐意出版这本没有经济效益的书。对于他们大力支持学术的义举，我们谨表示衷心的感谢与深挚的谢忱。

2005年岁杪草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目 录

序	陶文鹏 刘跃进	1
试论梁启超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贡献	连燕堂	1
冒广生的诗词评论	冒怀辛	20
论王国维的艺术价值观	张本楠	37
论刘师培的文学观与文学史研究	王琦珍	55
论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	周勳初	68
忆伯翁		
——追记王伯祥先生	唐 弢	83
胡适整理文学遗产的成绩与偏失	胡 明	87
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成就与		
贡献	董乃斌	109
茅盾对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	尹恭弘	128
任中敏先生和他所建立的散曲学、唐代		
文艺学	王小盾 李昌集	149
朱光潜论中国诗的声律及诗体衍变	钱念孙	173
读孙楷第先生的学术论著	邓绍基	192
我所认识的孙楷第先生	刘乃和	206
孙楷第与《戏曲小说书录解题》	田 杉	214

陈子展先生的《诗经》研究	徐志啸	220
朱自清先生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	李少雍	231
闻一多的中国文学史研究	费振刚	250
祝贺《俞平伯全集》的出版		
——在《俞平伯全集》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	冯其庸	263
浅谈俞平伯先生的词论著作	邓绍基	268
文章千古事,品德万人钦		
——怀念俞平伯先生	刘世德	275
夏承焘与中国当代词学	施议对	286
唐圭璋先生对词学的贡献	曹济平	302
姜亮夫先生及其楚辞研究	刘跃进 江林昌	316
现代词人龙榆生及其词学贡献	宋路霞	336
缅怀与思考		
——纪念先师刘大杰先生	林冠夫 林东海	347
余冠英的《诗经》研究	王长华	366
于平实处见精神		
——萧涤非先生的治学道路	林继中	378
董每戡先生的古代戏曲研究	黄天骥 董上德	392
姜书阁先生的学术追求与成就	蒋 方	405
吴组缃先生的古典小说研究	周先慎	419
平生未作干时计,后世谁知定我文		
——吴世昌先生治学之道及成就	施议对	441
吴世昌与词体结构论	施议对	461
诗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		
——林庚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	葛晓音	490
逯钦立的汉魏六朝文学研究业绩	张连科	516
何其芳同志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贡献		

——谨以这篇小文纪念他逝世十周年·····	邓绍基	533
文艺学与文献学的完美结合		
——程千帆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	巩本栋	551
王瑶先生对中古文学研究的贡献·····	葛晓音	586
活的历史与活的美学		
——论吴调公的中国文艺美学史研究方法·····	高小康	598
川水虽逝却留痕		
——纪念吴晓铃先生·····	吕薇芬	619
我心目中的马茂元先生·····	赵昌平	628
通新旧之学 达古今之理		
——论陈贻焯先生的古代文学研究·····	葛晓音	645
裴斐先生与李白研究·····	葛景春	667
不傍古人著心史		
——严迪昌先生古代文学研究述评·····	马大勇	682
编后记·····	陶文鹏 刘跃进	699



梁启超(1873—1929)

1

试论梁启超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贡献

试论梁启超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贡献

连燕堂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历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著名的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同时也是一位博古通今、承先启后的资产阶级学问家。梁启超学问欲极炽,学殖极广博,文笔条畅,著述等身,徐佛苏说他“平昔眼中无书、手中无笔之日亦绝少,故生平之著述总额人皆谓有‘二千余万字’之多,占古今中外作家之第一位”,“确为‘世界第一之博学家’无疑”^①。在这卷帙浩繁的著作中,举凡今之所谓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几无不涉猎。若就学术研究的成绩而论,他的贡献首在史学,学界公认他为“史学大师”,“资产阶级史学的开山鼻祖”,几无异词。他在文学理论建设和古典文学研究方面也有着显著的成绩,不过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

青年时期,具体地说,自戊戌变法前夕至本世纪初,梁启超鼓吹变法、新民,倡导思想解放,呼吁四大自由,宣传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及理论,被称为“舆论界之骄子”,“思想界之先锋”。他在大声疾呼“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坏而齑粉之”的同时,又大声疾呼:“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辟

^① 见《梁启超年谱长编》第1204页。徐氏以为梁启超的著述当约一千四百万字内外。

之。”他怀着强烈的社会意识、阶级意识、历史的与时代的使命意识,代表新兴的资产阶级,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进行尖锐的批判,动摇了旧思想、旧文化的根基,收到了思想启蒙的效果,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和建立开辟了道路,在当时寻求思想解放的青年中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此期间,他响亮地喊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口号,呼唤资产阶级新文学的产生。经过他和同时代许多人的艰苦努力,促成了散文的解放,诗歌的革新,小说的崛起和戏剧的改良。对于封建主义旧文学来说,这些都有去旧布新的划时代意义,为“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探索了道路,准备了条件。在理论上,他提倡俗语文学,指出由古语之文学变为俗语之文学是文学进化之一大关键,他给小说以“文学之最上乘”的地位,给戏曲以文学之“大国”、韵文之“巨擘”的地位,不仅纠正了社会上鄙薄小说、戏曲的传统观念,改变了仅以诗文为正宗的传统文学结构,而且说明在本世纪初他就有了白话文学史、俗文学史的构想,为以后胡适、郑振铎等之专门研究开启了先河。

总之,“平心而论,梁任公的地位在当时确是不失为一个革命家的代表”(郭沫若:《我的童年》,《沫若选集》第三卷第99页)。

“五四”运动以后,梁启超已进入晚年。他在思想界已经失去了先进地位,但作为一个学者却更成熟了。此时,他脱离政界,致力教育,在清华等校任文史两科教授,又利用假期到其他学校演讲,并把讲义、讲稿整理成文,留下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也影响、培养和造就了一批卓有建树的后辈学者。他的学生周传儒教授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总结他治学和育人的特点说:其所讲半属入门之学,为诸生指示治学途径及方法,然亦足见其欲欲包举两千年来中国之学术文化合于一炉而冶之。他尊重学术,

尊重学者,对前人负责,对后代负责,这种严正的情操,对当时受业诸青年、弟子感化力极大,皆心悦诚服,潜移默化,奉为楷模,循守弗渝。他学识渊博,会通今古,贯串百家,既汪洋若千顷之陂,莫测涯涘,又扼要勾玄,深入浅出,使人人可游溯,处处可有得。他既能融会汉学家治经、治小学与欧洲治社会学、治历史学之方法,严正精审,密不透风,又能在群山万壑中独辟蹊径。他舌端笔底带感情,使亲闻警咳者如坐春风,披阅文章者如沃醇醪^①。他在文学研究方面的著作虽不及史学方面的丰富多彩,但也有相当的水平和可观的数量,其代表作如文艺理论:《美术与科学》、《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美术与生活》;诗论及诗史:《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的《诗经》及《楚辞》部分、《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作家、作品研究:《情圣杜甫》、《屈原研究》、《陶渊明》、《辛稼轩年谱》、《〈桃花扇〉注》,等等。在这许多著作中,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狭隘的偏见和浮浅的论断,但确也含有不少熠熠闪光的创见,在中国文学研究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梁启超晚年在古典文学研究上的建树,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称道的:

一、适应时代潮流,鼓吹“思想解放”,提倡“科学精神”,介绍科学方法。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乃“五四”时期基本精神之一。这时的梁启超虽已失去在思想界的先进地位,但与康有为、严复、林纾、章太炎等不同,他是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思想统一战线的。作为加入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

^① 参见周传儒:《史学大师梁启超与王国维》,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1期。

思想统一战线的资产阶级一翼的代表,梁启超对思想解放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要建成强固的国家、进步的社会,就要充分发挥全体国民的个性,要把各人的天赋良能发挥到十分圆满,人人各用其所长,自动地创造进化。而在中国旧社会的束缚驰骤之下,徒以社会上畸形的组织,学说上惰性的权威,把各人的本能从小就桎梏斫丧起来,因而才智断不能产生。要个性发展,必须从思想解放入手。什么叫思想解放呢?他说:所谓思想解放,就是“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经此一想,觉得对我便信从,觉得不对我便反抗。‘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这是韩昌黎极无聊的一句话。圣人作学问,便已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择善而从’,不经一番‘择’,何由知得他是‘善’?只这‘择’字,便是思想解放的关目。欧洲现代文化,不论物质方面、精神方面,都是从‘自由批评’产生出来。对于在社会上有力量的学说,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总许人凭自己见地所及,痛下批评。批评岂必尽当,然而必经过一番审择,才能有这批评,便是开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这批评,又引起别人的审择,便是开了社会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浚发,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运自然日进。”他认为,所谓圣人、权威,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他必是将自己的思想脱掉了古代思想和并时思想的束缚,独立自由研究,才能立出一家学说,不然,这学说可不算他的了”。我们敬重他,学习他,“第一件便须学他用思想的方法”。我们中国千余年来,学术所以衰落,进步所以停顿,都是因为没有作到这一点,而是学了一个反面,用一个人的思想作为金科玉律,将别人的创造力抹杀,将社会的进步勒令停止了。所以他主张:“任凭青年纵极他的思想力,对于中外古今学说随意发生疑问。

就是闹得过火,有些‘非尧舜薄汤武’,也不要紧。不要害怕‘离经叛道’”;“若使不是经、不是道,离他叛他不是应该吗?若使果是经、果是道,那么俗语说得好:‘真金不怕红炉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评攻击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评拥护他,经一番刮垢磨光,越发显出他真价。”他的结论是:“思想解放,只有好处,并无坏处。”所以他要“苦口谆劝那些关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这个潮流罢”^①!

我们可以看出,梁启超的这篇思想解放论,仍然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而且隐有抵制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意图在内。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他的主要矛头还是指向束缚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思想的,其基本论点是符合“五四”时期思想潮流的。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来看,其合理成分更多一些,因而影响也更大。他本人作学问,即能解放思想,大胆探索,穷原竟委,正误辨伪,择善而从,以后“古史辨派”的产生,恐怕也跟他颇有渊源。

科学和民主是“五四”时期两面光辉的旗帜。思想解放与科学精神亦相辅而相成。在学术研究上,梁启超提倡科学精神,介绍科学方法,嘉惠后学,功在不没。特别是他明确指出社会科学也是科学,也必须用科学精神去研究。这对改变鄙视社会科学的传统偏见、促进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他说:过去,中国人把科学看得太低了、太粗了、太呆了、太窄了,“他们以为只有化学、数学、物理、几何等等才用得着科学。殊不知所有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等,只要够得上一门学问的,没有不是科学,我们若不拿科学精神去研究,便作那一门子学问也作不成”。那么,什么是科学精神呢?他认为:

^① 《欧游中之一般观察及一般感想》下篇,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五册。本文所引梁著均见《饮冰室合集》,以下只注篇名。

“有系统之真智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智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他进一步强调说:“科学要给我们的,就争一个‘真’字。”而“我们想对于一件事物的性质得有真知灼见,很是不容易。要钻在这件事物里头去研究,要绕着这件事物周围去研究,要跳在这件事物高头去研究;种种分析研究结果,才把这件事物的属性大略研究出来,算是从许多相类似容易混淆的个体中,发现每个个体的特征。换一个方向,把许多同有这种特征的事物归成一类,许多类归成一部,许多部归成一组;如是综合研究的结果,算是从许多各自分离的个体中发现出他们相互间的普遍性。经过这种种工夫,才许你开口说‘某事物的性质是怎么样’。这便是科学第一件主要精神。”但是这还不够,“还要知道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关系”,从而“因此推彼,得从所已知,求出所未知,等等”(《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他认为中国学术界存在着笼统、武断、虚伪、因袭、散失等弊病,要克服这些弊病,“除了提倡科学精神外没有第二剂良药了”。

我们可以看到,梁启超对科学所下的定义并不完善,他所说的科学精神,也不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但他融汇中国朴学大师的治学经验和西方哲学名家的方法论,其中确有合理成分,至今仍未失其实用价值。梁启超倡导的科学精神基本上符合“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也是“五四”运动所促成的中国资产阶级阶级意识进一步觉醒的思想表现和学术成果。他身体力行、孜孜以求地使用他所理解的科学精神进行研究工作,并在研究成果中结合实例、深入浅出、具体生动地进一步介绍了一系列治学方法和治学态度,对后辈学者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二、阐明文学艺术的特性,标举中国韵文的表情方法,建立了以情感说为中心的创作、研究、鉴赏体系。

文学艺术的本质或特性是什么？这是古今中外的文艺理论家一直争论不休的重大课题。梁启超认为：“艺术是情感的表现”（《情圣杜甫》），“诗本为表情之具”（《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诗经》），“美术的任务自然是在表情”（《美术与科学》）。总之，他主“情感”说。他的情感说大体可分以下几个层次：

（1）情感的性质和作用。梁启超认为：“情感的性质是本能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质是现在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现在的境界。我们想入到生命之奥，把我的思想行为和我的生命进合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众生进合为一，除却通过情感这一个关门，别无他路。所以情感是宇宙间一种大秘密。”情感比理智更能影响以至制约人的行为，“用理智来引导人，顶多叫人知道那件事应该做，那件事怎样做法；却是被引导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没有什么关系，有时所知的越发多，所做的倒越发少。用情感来激发人，好象磁力吸铁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铁，丝毫容不得躲闪”。所以他又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情感这样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催眠术，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2）情感和艺术的关系。他说：“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掌住了。艺术的权威，是把那霎时间便过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随时可以再现，是把艺术家自己‘个性’的情感，打进别人们的‘情阈’里头，在若干期间内占领了‘他心’的位置。”（《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3）情感、艺术和真善美。他说：“情感越发真越发神圣。”（《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所谓“真即是美”、“真才是美”，所以“求美先从求真入手”。求美、求真的关键在“观察自然”，“美术家所以成功，全在观察‘自然之美’，怎样才能看得出自然之美？最要紧的是观察‘自然之真’”。但是，“认识自然不